

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^{〔*〕}

——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

江守义

(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,江苏 南京 210097)

〔摘要〕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,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。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,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,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,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;同时,部分士人形成小说可“补史”和“文无愧于史”的观念,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,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。书坊主和士人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,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。

〔关键词〕伦理处境;评点;明代历史小说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24.02.010

明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发展为小说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外在客观基础,历史演义小说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门类,“历史演义就是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敷演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,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义理的小说。它以尊重历史事实为核心的文体规范,同时又艺术化地融合史实和想象,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上有一定的创新和发挥”,^{〔1〕}因而能够被广泛接受。明代历史小说接受有一个醒目的记号,即评点,接受者通过评点表达自己对小说的理解。同时,接受者接受这些历史小说,有一个前提,即接受者自身的伦理处境,在不同的伦理处境中,面对同样的文本,可能会进行阐释,也可能不进行阐释,进行阐释时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这样看来,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是明代历史小说接受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一、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

明代历史小说接受者的伦理处境,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:一是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;二是士人伦理观念的变化。

明代商人伦理的形成,是儒贾相通的结果。随着商业的兴盛和士商合流的发展,传统的“士农工

作者简介:江守义,文学博士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〔*〕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”(19ZDA24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商”的社会等级划分,已不能满足商人群体与“财”俱增地对社会地位的要求。社会上,形成一种士人重商和商人自重的潮流。明代士人对商人的看法较之宋元时期,已发生根本变化。王阳明从“心学”出发,指出: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”,士农工商在“道”面前完全平等,排在最后的“商”并不比排在最前的“士”要低一些。王阳明去世前三年作《节庵方公墓表》,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肯定:“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,其尽心焉,一也……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,则一而已……四民异业而同道。”^[2]士、农、工、商阶层只要能“尽心”于其所“业”,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没有什么不同。归有光所说的“古者四民异业,至于后世,而士与农、商常相混”,^[3]当是明中后期的一种社会现实。士人对这种现实的承认,是商人伦理形成的重要条件。

不仅明朝的士大夫承认“士”与“商”相混,商人也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“士”殊途同归,对商人有偏见的李梦阳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商人王现(文显)的话,反而显示出商人对“商与士,异术而同心”的信心和抱负,“文显尝训诸子曰:夫商与士,异术而同心。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,是故虽利而不汙。善士者引先王之经,而绝货利之径,是故必名而有成。故利以义制,名以清修,各守其业。”^[4]这意味着“明代商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已足以与士人相抗衡了”。^[5]王现是明中期人,到明后期,新安商人汪道昆在《浩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》中说:“大江以南,新都以文物著。其俗不儒则贾,相代若践更。要之,良贾何负閎儒!”^[6]“良贾何负閎儒”说得大气磅礴,商人的自信溢于言表。

既然商人和士人无高下之分,从士抑或从商,就完全可以是个人的选择,以前的士业至上、唯举是图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。由于商业发展,书籍普及,读书人增多,但科举名额有限,导致很多读书人弃儒从商,成为儒商。不少儒商就加入到小说创作和接受的行列中来,成为书坊主。明代历史小说的兴盛与小说接受的推广,与书坊主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。书坊主虽然从事商业谋利活动,但商人伦理并非唯利是图,而是在谋利的同时不忘士人的伦理教化职责。熊大木作为书坊主,刊行了不少历史小说,在《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》中,他将刊行小说和宣扬纲纪视为同一件事:“武穆王《精忠录》,原有小说,未及于全文。今得浙之刊本……然而意寓文墨,纲由大纪,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,或有之矣……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……于是不吝臆见,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,按《通鉴纲目》而取义。”^[7]新刊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》的目的,不仅可以“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”,也可以弘扬朱熹《通鉴纲目》中的纲常名教。

书坊主不仅创作小说,同时作为接受者还想办法推广小说,如何创作和推广小说,就涉及商业伦理问题。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,社会生产力提高,商品经济和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,出现了经商热潮,“今夫天下之人,不为商者寡矣,士之读书,将以商禄;农之力作,将以商食”。^[8]商业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财富快速流动的同时,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。由于明初统治者重视教育的一系列举措,到了万历年间,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,大量市民加入到读者行列中来,使得明代小说的读者队伍由士人、商人为主转变为以市民为主。在利益驱使之下,书坊主积极地改变刊刻形式、增加吸引读者兴趣的内容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小说的传播和接受。历史小说传播和接受中凸显出来的商业伦理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对经济利益的追求。在商言商,毋庸讳言,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商业的首要目的。历史小说的刊刻者和接受者都会考虑到商业因素,如何刊刻能多卖,如何挑选刻本能省钱,是卖家和买家心态的自然流露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,让很多畅销的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反复出现。嘉靖年间刊刻的《三国演义》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,便出现余象斗所说的“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”^[9]之情形。为了

追求利益,就要在书的设计上尽量吸引读者,于是,刊刻时加入插图和评点就成为一时风行的做法。对读者特别是下层读者来说,插图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吸引他们的阅读兴趣,增强他们对于小说文字的理解力,另一方面也可以补足小说在文字、情节等方面的不足之处,和评点一起,以达到“尽其言”的艺术效果。明末人瑞堂刊刻的《隋炀帝艳史》就在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图,并在“凡例”(一种评点)中点明对插图的关注:第八则“坊间绣像,不过略似人形,止供儿童把玩。兹编特悬名笔妙手,传神阿堵,曲尽其妙。一展卷,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,不啻顾虎头、吴道子之对面,岂非词家韵事、案头珍赏哉”;第九则“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,与事符合者,以为题咏证左,妙在个中,趣在言外,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”;第十一则“锦栏之式,其制皆与绣像关合”;^[10]等等。可以看出,该刊本在刊刻时不仅注重在小说内容中插入图像来吸引读者,还注重插图与小说文本内容的相合程度,更注重在编排时插图与小说的样式是否相配合,如此精心编排自然也是为了吸引读者购买,颇有“广告”的意味。

其二,迎合读者消费水平,提升服务意识。为了能让经济水平不高的市民读者进行消费,书坊主往往降低书价来刺激消费,如何既降低书价又保证客源不流失就成了书坊主费心思考的问题。改变小说的刊刻格式是最便捷的降价方式,主要有两种方式:一是增加每页字数;二是采取合刊。明代通俗小说的刻印的标准版式大多是每半页10行,每行20字,为了降低书价,可以在翻刻时每页多印一些字,“如诚德堂主熊清波刻印的《三国演义》,就是每半页14行,每行28字,共392字,与标准格式相比,每半页的字数增加了一倍。虽然刻工的费用没有减少,但书版、纸张、印刷等费用的支出均可降低一半,书价也就相应地降低了”,^[11]诚德堂本《三国演义》时有插图,有插图时每半页仍14行,每行19字。书坊主虽然改变了刊刻的标准格式,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心理,并没有删去小说中的插图,反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刊刻形式来进行售卖,“天启间黄正甫刊印的《三国演义》尽管是上图下文,但格式却是每半页15行,图下大行34字,小行26字,即每半页不仅有图,而且还印上了400—500字”,^[12]书商们将一些图文也插入进去使得每页的内容十分丰富,真正做到了“图文并茂”,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。采取合刊则是书商们的一大创举。读者们花费相对较少的价钱却能购得两本小说,这一举措既可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又符合他们的经济水平,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售卖方式。合刊的好处,往往也通过评点来加以说明。崇祯年间,建阳熊飞馆在刊刻《英雄谱》时,书坊主熊飞在封面上附有说明,“语有之:‘四美具,二难并’,言譬之贵合也。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二传,智勇忠义,迭出不穷,而两刻不合,购者恨之。本馆上下其驷,判合其圭。回各为图,括画家之妙染;图各为论,搜翰花(应为‘苑’——引者)之大乘。较籀精工,楮墨致洁。诚耳目之奇玩,军国之秘宝也。识者珍之!”^[13]熊飞敏锐地发现读者的需要,将两本优质的畅销书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合二为一,但却并没有忽视小说的质量,不仅增加精致的插图还邀请名家题咏,将服务意识发挥到极致。

其三,将经济利益和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。书坊主用插图、合刊等手段来促销自己刻本的同时,几乎每个书坊主都自己出面或请人作“序”(一种评点)说明自己的刻本对伦理教化的意义。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弃儒从商,刊行《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》二十卷,在书名中标注“音释补遗”,“是最早正式标榜‘批评’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版本”,^[14]卷首《题全像评林三国志叙》上方板框内有《三国辩》,云:“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……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,人物字画各无省陋,以便海内士子览之,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。”^[15]这显然是在推销自己的版本。版面上方为“新增评断”,中间是图像,下方是正文,和以前的刊刻本相比,“新增评断”显然是自己的一个卖点。^[16]万历三十四年,又刊刻《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》,正文前有《题全像列国志传引》,称该书有“善则知劝,恶则知戒”^[17]之功用,封面有余文台“识语”:^[17]“《列国》一书,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,惟

板一付,重刊数次,其板蒙旧。象斗校正重刻,全像批断,以便海内君子一览,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。”^[18]卷一首页之眉栏写有“列传数句,将列国一本包尽”,^[19]同样将戒恶劝善和刊本推销联系在一起。

二、士人伦理观念的变化

明代以前,从事小说创作的都是下层文人。因为小说长期被视为“小道”,很多文人不屑于小说创作,到嘉靖、万历年间,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,商品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,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,使得以商贾、工匠、城市平民为主的市民阶层兴起壮大,同时,带来了“富者愈富,贫者愈贫”的社会现象,并导致社会风俗趋向奢靡。与经济日益活跃、风俗逐渐奢靡相伴随的,是朝政的日益荒废与士人对朝政的日渐失望。正德、嘉靖、万历三朝,帝王荒怠乱政,朝臣党同伐异现象愈演愈烈,“养成止有朋党而无政府之状……庸主济以庸臣,所以合而酿亡国之祸也。”^[20]整个大明王朝笼罩在一片末世光景之中,如黄仁宇所言,“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……最后的结果,都是无分善恶,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,有的身败,有的名裂,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。”^[21]政治秩序的废弛与社会风俗的颓堕,使得士人的政治理想受到挫败,欲起衰救弊而无门,士人心态发生变化。明人胡应麟曾结合通俗小说对士人这种矛盾心态有所描述:“古今著述,小说家特盛;而古今书籍,小说家独传……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,且斥其非而暮引用之,犹之淫声丽色,恶之而弗能弗好也。夫好者弥多,传者弥众,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,夫何怪焉?”^[22]一部分士人既以传统观念来轻视通俗小说,同时又将移风易俗的努力、进退辞受的心迹寄托于有广泛影响的小说之中。历史小说既通俗易懂,又按鉴演义,不乏儒家伦理大义,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类型。士人阶层的加入,让接受历史小说的文人队伍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。有论者指出:文人队伍“既有下层文人,如张凤翼、王稚登等,又有高官巨卿(如王世贞)和著名文士(如陈继儒、李贽、汤显祖等)。这些文人在政坛和文坛上大多享有较高的声誉,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,其言行必然改变整个社会对小说轻视鄙薄的态度,吸引更多文人加入编著、评点小说的行列。明代大批著名文士、上层知识分子喜爱小说、重视小说,同时活跃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,也是该时期文言小说评点的一大特色”^[23]不仅文言小说的接受者中有士人,历史小说的接受者同样也有士人。士人的伦理观念较之以前已有变化,就历史小说的接受而言,主要有以下两点:

其一,由小说是“小道”转变为小说可“补史”。小说是“小道”的观念由来已久,无需多言。历史小说要想冲破这种“小道”观念,就要将小说比附于史书。这种意识不仅使书坊主刊刻历史小说有了底气,也让文人对小说的观念有了转变:小说不再是“小道”,而是可以“补史”。几乎每本历史小说都会在序言中竖起羽翼信史、补正史之阙的旗号。陈继儒《叙列国传》云:“有学士大夫不及详者,而稗官野史述之;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,而渔歌牧唱能案之……《列传》始自周某王之某年,迄某王之某年,事核而详,语俚而显……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。”^[24]明确了历史小说的补史功能。陈继儒虽有“山中宰相”的名望,但毕竟是下层文人,成化进士林瀚可谓地道的士人,他在《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》中说:“后之君子……以是编为正史之补,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,是盖予之至愿也夫。”^[25]袁于令也是士人,其《隋史遗文序》云:“史以遗名者何?所以辅正史也……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,原不必与史背驰也。窃以润色附史之文,删削同史之缺,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,相成岂以相病哉?……或与正史之意不无补云。”^[26]表明了作者虽在原作的基础之上进行改编,但仍然视俗本有补正史的作用。

其二,由“史贵于文”转变为“文无愧于史”。历史小说要按鉴演义,其前提是“史贵于文”,但当历

史小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,接受者要推广历史小说,就要抬高历史小说的地位,仅仅指出小说可以“补史”,还不能完全摆脱小说对史书的附庸地位。要摆脱小说对史书的依附,就要将小说和史书等量齐观。陈继儒《叙列国传》在称该书“足补经史之未赅”之后,意犹未尽,称“《列传》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。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”。^[27]可观道人《新列国志叙》盛赞历史小说寓教于乐的功能,将其与经史相提并论:“往迹种种,开卷瞭然,披而览之,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。若引为法诫,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,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……兹编更有功于学者,浸假两汉以下,以次成编,与《三国志》汇成一家言,称历代之全书,为雅俗之巨览,即与‘二十一史’并列邳架,亦复何愧?”^[28]与陈继儒和可观道人相比,李贽和袁宏道在士人中影响巨大,他们将小说和经史并列,才真正在士人阶层中形成一种“文无愧于史”的观念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将《水浒》和司马迁所说的《说难》《孤愤》都看作是“发愤之所作”,^[29]在《焚书》中认为《水浒传》是“古今至文”,^[30]既将小说和圣贤之作相提并论,又极力称赞小说的艺术水准。袁宏道在《听朱生说水浒传》中表示,和《水浒》相比,“《六经》非至文,马迁失组练”,^[31]就文字功夫而言,小说超过了经史。由于“李贽等人当时的声望极高,具有相当的号召力,而他们关于小说的见解又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,因此到了万历后期,小说可与经史并传的评价得到了广泛承认”。^[32]到清代,蔡元放甚至认为小说可取代经史,但经史则不能涵盖小说:“我今所评《列国志》,若说是正经书,却毕竟是小说样子,子弟也喜去看,不至扞格不入。但要说他是小说,他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。子弟读了,便如将一部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都读熟了,岂非快事。”^[33]在他看来,《列国志》在严肃枯燥的正史和趣味性极强的小说间达到了平衡,正史不能取代小说,小说则是正史之支流,所谓“稗官固亦史之支流”^[34]是也。如此论述,显然是将明代士人中形成的“文无愧于史”作为前提了。

由于士人的影响,书坊主经常借助士人的名分为自己的小说进行宣传。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刻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封面“识语”上写有“辄购求古本,敦请名士,按鉴参考,再三讎校”,^[35]以“名士”二字作为招徕顾客的卖点。姑苏龚绍山梓本《春秋列国志传》“识语”云:“本坊新镌《春秋列国志传批评》,皆出自陈眉公手阅”,^[36]特意点明为“陈眉公”批阅。虽然书坊主托名士人,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,但从侧面说明了两点:一是士人对小说传播产生了影响;二是士人愿意作为小说接受者来传播小说。

三、评点形式的运用

上述伦理语境,无论是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是士人观念的变化,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,是历史小说的推广和流行。为了更好地推广历史小说,一方面,书坊主化身为小说接受者对小说加以评论(可以亲力而为,也可以假借名人),有时也请人对小说加以评点;另一方面,一些文人(包括士人)愿意以接受者的身份给小说作序跋或随文加以注评,这导致评点成为小说接受的一种常态,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(包括历史小说)的一大特色。

顾名思义,评点含有评论与圈点之意。从其源流上来看,小说评点与人物品评有着深厚的渊源,徐师曾认为,“按字书云:‘评、品论也,史家褒贬之词。’盖古者史官各有论著,以订一时君臣言之是非。然随意命名,莫协于一。故司马迁《史记》称太史公曰,而班固《西汉书》则谓之赞,范曄《东汉书》又谓之论,其实皆评也。而评之名则始见于《三国志》。后世缘此,作者渐多,则不必身在史局,手秉史笔,而后为之矣。”^[37]“评”本是史臣“褒贬”“君臣言之是非”的行为,后由史书扩展至其他文体,由此可见“评”本是出自史家之手,虽然名称不一,但一般含有道德评判的意味。圈点亦与史书有着密切

联系,“史中圈点,岂曰饰观,特为阐奥。其关日照应,血脉联络、过接印证,典核要害之处,则用◦。或清新俊逸,秀雅透露,菁华奇幻,摹写有趣之处,则用○。或明醒警拔,恰适条妥,有致动人处则用◡。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,批评总月旦之精,乃理窟抽灵,非寻常剿袭。”^[38]可见,“点”即是评点者提示读者作品某处在整体结构、语言风格等方面尤为关键,读者要在此停留品味。相较于“评”的现身说理、直接明了,“点”更显含蓄灵巧,既对读者进行阅读指导,也给读者留下充分的阐释空间。

唐宋以来,以经文注疏、诗文品评为代表的文本细读,在批评旨趣与批评形式上对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中国向来有注经传统,“经也者,恒久之至道,不刊之鸿教也。故象天地,效鬼神,参物序,制人纪,洞性灵之奥区,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”^[39]道、圣、经三位一体:欲原道,必要征圣;欲征圣,必要宗经。《毛诗》《楚辞章句》等,更是为文本的精致化解读提供了范例,比如唐宋以降盛行的大量诗话,其主要内容在于“辨句法,备古今,纪盛德,录异事,正讹误也”。^[40]南宋诗话中,评句法、论法则的内容逐渐增多,内容上有对“言志”“咏物”等传统诗论的深化,也有“夺胎换骨”“妙悟”等新命题的开拓;基本形式有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等。诗话中的命题是在论者反复研读、用心揣摩之后得出的,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文本中心意识。与此同时兴起的,还有对古文经义的评点,这不仅与诗话的文本细读如出一辙,更为小说评点的形式提供了借鉴。古文篇幅较长,不似诗歌摘句品评那样可随性生发、汇为一说,必须附文着笔方能发表议论、示人门径。如吕祖谦编《古文关键》意在“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,示学者以门径,故谓之关键,卷首冠以总论看文、作文之法”。^[41]谢枋得的《文章轨范》则要“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,名之曰《文章轨范》。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,是独为举业者设耳”。^[42]可见,宋代的古文评点带有很强的实用性,意在示人以篇章字句之法,让人明白如何看文作文,以便于儒士科举。姚瑛在《崇古文诀跋》中进一步指出,古文评点不仅有形而下的方法论价值,还担负着探求古人用心的价值观方面的价值,“文者,载道之器。古之君子非有意于为文,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,故曰‘辞达而已’。夫能达其辞于道,非深切著明,则道不见也。此文之有关键,非深于文者,安能发挥其蕴奥而探古人之用心哉?”^[43]无论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,古文评点都离不开对文本条分缕析的精致化分析,一般来说一般包括三个方面:卷前的作文“文法”、每篇的“总评”、随文所附的评语与圈点。这与小说评点中经常出现的“读法”“回评”以及眉批、夹批与圈点等如出一辙。如《文章轨范》评点韩愈《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,在“休徵嘉瑞,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”后夹批:“十四字句。此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,变化七样句法,字有多少,句有长短,文有反顺、起伏、顿挫,如层澜惊涛怒波,读者但见其精神,不觉其重叠,此章法句法也。”^[44]到宋代刘成翁评点《世说新语》,在眉批中注意品鉴人物的言行特征,带有明显的文学批评色彩,开小说评点之先河。

明代小说创作的繁盛、书坊主和文人儒士对小说评点的关注,是推动小说评点走向繁盛的直接原因。就历史小说的创作而言,其特点有三:首先是数量众多,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到宋朝,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历史演义作品,还出现了《英烈传》等本朝小说。据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统计,“明清讲史部”著录有《三国》以外的小说163部之多;^[45]据《小说书坊录》粗略统计,明中后期至少有六十余家书坊刊刻历史演义,刊刻数多达百余部。^[46]其次是题材扩展,出现了一批专写时事的通俗演义,多是反思与抒愤之作。如颂扬报国忠臣的《辽海丹忠录》,揭露魏忠贤乱政误国的《梼杌闲评》等,使小说显现出较浓的时代气息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。最后是注意到小说创作的审美特性,如意识到小说可以适当进行艺术虚构,不必过于拘泥史实。《新刻续编三国志引》云:“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,固非国史正纲,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,或解闷于烦剧忧愁,以豁一时之情怀耳。”^[47]《三国志后传》将刘渊当作蜀汉后人即是违背史实的虚构。

小说创作的勃兴为小说评点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。起初,书坊主借助评点来推销自己的刻本。明代不少书坊主都兼具小说家身份,熊大木、余象斗、袁于令,这些书坊主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学修养,他们往往自己创作小说来加以刊刻,有时为了销路还为之评点,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商型评点队伍。同时,这些书商也假借别人名义或请别人为自己的刻本作序跋,以推广自己的刻本,如蒋大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。从万历四十一年林梓为同乡友人孙高亮的《于少保萃忠传》^[48]作序开始,士人阶层开始介入小说的接受领域。此后,文人参与评点已蔚然成风,李贽评点《三国演义》、袁宏道序《东西汉演义》可为代表。这些文人或出于友人之托,或出于抒发胸臆,或出于自娱自乐,都以他们独到的眼光对历史小说加以评点,这些评点在提升小说文类、挖掘小说艺术价值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。小说评点正是在以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文人手中走向成熟,至明末清初金圣叹而至巅峰。明代小说刊刻对评点的重视,“居然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:凡当时推出一部小说,如果要让它出名,或有点品位和上点档次,似乎就必须要有评点,最好是名家的……有些小说初版时无评点,再版时硬加也要加上去。所以,对小说的评点,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,而且成了一种时髦,一种包装,一种难以言喻的广告效应。”^[49]

从形式上看,评点常常与作品融为一体,包括眉批、旁批、夹批、总批、圈点和总评等,这几种评点形式往往随文“寄生”,短小精炼[如毛宗岗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夹批“白蛇斩而汉兴、青蛇见而汉危。青蛇、白蛇,遥遥相对。○‘惟(维)虺惟(维)蛇,女子之祥。’寺人正女子一类也,故有此兆。”^[50]],因此需要紧扣作品才能理解,否则便如隔雾看花。序跋、读法、题辞等虽然也需要结合文本,经过比对才能获得更完整的理解,但也可以将其与小说分离当作批评专论来读,如蒋大器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、李贽的《忠义水浒传序》等。从内容上看,评点可以是对小说人物、情节、主题的说明(这些说明往往涉及伦理说教方面的内容),也可以是对艺术手法的提炼和总结。总体而言,小说评点是一种兼具美学与伦理双重维度的叙事接受形式。

就明代历史小说评点形式的发展而言,起初书坊主在翻演史书故事时,为了区别于史书,小说的通俗易懂是基本要求。“至于史学,其书既灏瀚,文复简奥,又无与于进取之途,故专门名家者,代不数人。学士大夫则多废焉,置之偶一展卷,率为睡魔作引耳。”^[51]历史小说要通俗,除了用白话创作外,在涉及一些古代地名、古代官职等一般读者不太明白的地方,还需要加以注释,好让读者明白,有助于小说的阅读。可以说,早期的小说评点发源于“注释学”,是一种在“注释学”和“文选学”结合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批评形式,评点形式也大多为注评结合,“于是注文与正文的一体遂成为后世注释在体例上的定制。而小说评点中的夹批、旁批和评注等即缘此而来。”^[52]因此,“注释”也可作为评点的一种形式。熊大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并没有对小说文本的内容进行过多的艺术性的阐发,主要是就小说内容进行“注释”,他在自己的四部历史演义小说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》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《全汉志传》《南北宋志传》中穿插了大量的注释,这些注释大多为人名、地名、官职名称、风俗典故、注音等,主要都是为了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,使小说便于阅读。如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卷六第五十九节,“起居事杜正伦曰:‘臣职在记言,陛下之言有失,臣必书之’”一句,在“起居事”后夹注“官名”二字。^[53]诸如此类通俗化的解释,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读者可以在阅读时充分理解小说内容,从而吸引读者购买。

和书坊主的评点相比,文人评点有所拓展,不再局限于疏通文义,而是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提炼,进而对小说的独特价值给予总结,折射出文人评点者的精神世界。不妨以李贽的评点为例稍加说明。在评点《三国演义》时,李贽对小说的人物、情节和主旨有所说明。第九回回末“总评”人物:

“王司徒临难不为苟免,以身许国,真社稷臣也!真社稷臣也!”^[54]第二十二回回末“总评”情节:“玄德不杀刘岱、王忠最为有见,妙处更在复后翼德拦住,云长劝开,更有波澜。此皆玄德英雄妙算也。然二公亦是对手,所以做得绝无痕迹。”^[55]第一百十九回回末“总评”主旨:“老瞒奸如鬼域,济以曹丕小奸,做成受禅之台,仿佛唐虞故事,欲以欺诳天下后世也。谁知四十年后,乃为司马炎作一榜样乎?山阳、陈留,毫发不差,谓无天理否也?读史者至此亦可回头作好人矣。你想乱臣逆子,有何利益乎哉?”^[56]

当然,评点者在进行评点时的伦理动机是多种多样的,既有为小说正名的强烈的责任感,同时也有出于自身喜好的目的,以评点来自娱。李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,他在《寄京友书》中就明确表明过自己的创作动机:“《坡仙集》我有披削旁注在内,每开看便自欢喜,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……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,非为人也。”^[57]可以看出,他在评点时并非带有强烈的伦理责任感,而是借评点以自娱的成分更多一些。看他的《三国演义》评点,其中不乏大量“真性情”的狂傲之语。这意味着,评点者们的评点动机并不唯一,不同的评点者伦理目的与伦理倾向不同,自然会在评点时表达出不同的态度。

为了让自己的刻本更有市场,余象斗还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评点样式:评林体。“所谓‘评林’是将评语‘集之若林’之意”,^[58]其本意应该是融合多家评点为一体,既让众多接受者对该小说的看法同时呈现出来,以见出该小说吸引人之妙处所在;又显示出带有“评林”的刻本囊括了其他刻本的评点,有综合其他刻本之长的意思。但有一个现象需要指出来,只有余象斗明确将自己刊刻的小说以“评林”之名标出,而且它并不是诸多评点者评语的集合,只是一种“广告效用”。他的《全像忠义水浒传传评林》和《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》,虽然名为“评林”,但并没有其他评点者的评点,所有的评点全出自他一人之手,同时,刊刻时采用“上评、中图、下文”的版式,将评语置于版式的最上端,引起读者注意,其次是能增添读者乐趣的插图,然后才是小说正文,其用意在于以评补文、以图补评,将评语与插图结合起来,从而更好地理解小说正文。以此观之,在余象斗那里,插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“评”的方式,插图和评语共同组成“评林”。

总之,明代历史小说中评点的盛行,与接受者(评点者)的伦理处境密切相关。一方面,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,让一些举业无门的读书人转而成为书坊主,商业的竞争,让评点成为推销的手段;另一方面,书商虽然以谋利为第一要务,但仍不忘读书人的本分,将经文注疏、诗文品评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小说之中。这两方面的合力,让评点成为历史小说的通行法则。同时,小说可“补史”以及“文无愧于史”观念的盛行,让一些士人(甚至是有影响的高层文人)加入到评点行列,士人和书坊主一起,让评点花样翻新,成为历史小说争奇斗艳的一大亮点。

注释:

- [1] 纪德君:《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》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7页。
- [2] 吴光等编校:《王阳明全集》(中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,第776-777页。
- [3] [明]归有光:《震川先生集》,周本淳校点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319页。
- [4] [6] 转引自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458、459页。
- [5] 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458页。
- [7] [25] 黄霖、韩同文选注: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(修订本)》(上),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121、113页。
- [8] [明]丘濬:《〈江湖胜游诗〉序》,《丘濬集》第8册,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6年,第4077页。
- [9] [15] 石昌渝主编: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·白话卷》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299、299页。
- [10] 《艳史凡例》,〔明〕齐东野人编演:《隋炀帝艳史》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3辑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年,第6-7页。
- [11] [12] [32] 陈大康:《明代小说史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年,第576、576、556页。

- [13]朱一玄编:《明清小说资料选编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90年,第75-76页。
- [14]转引自涂秀虹:《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7年,第214-215页。
- [16]涂秀虹:《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7年,第73页。
- [17][19][明]余邵鱼编集: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》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4辑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年,第4-5、2页。
- [18][明]余邵鱼编集: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》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4辑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年,“封面”。
- [20]孟森:《明清史讲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258页。
- [21][美]黄仁宇:《万历十五年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05页。
- [22][明]胡应麟:《少室山房笔丛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1年,第282页。
- [23]董玉洪:《明代的文言小说评点及其理论批评价值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0年第3期。
- [24][27][28]丁锡根编: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年,第863、863、866页。
- [26][明]袁于令评改:《隋史遗文》,宋祥瑞校点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8年。
- [29][30][31]朱一玄、刘毓忱编:《水浒传资料汇编》,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171、170、197页。
- [33][清]蔡元放:《东周列国志读法》,黄霖、韩同文选注: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(修订本)》(上),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423页。
- [34][51][清]蔡元放:《东周列国志序》,黄霖、韩同文选注: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(修订本)》(上),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419、418页。
- [35]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4辑所收《三国志通俗演义(万卷楼本)》(即周曰校刊本)无封面,此处“识语”参看谭帆:《中国小说评点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73页。
- [36]转引自谭帆:《中国小说评点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74页。
- [37][明]徐师曾:《文体明辨序说》,[明]吴纳、徐师曾:《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2年,第143-144页。
- [38][明]爽阁主人:《禅真逸史凡例》,朱一玄编:《明清小说资料选编》上册,济南:齐鲁书社,1990年,第412页。
- [39][梁]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,祖保泉:《文心雕龙解说》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1993年,第40页。
- [40][宋]许颢:《彦周诗话》,何文煊辑:《历代诗话》(上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378页。
- [41][南宋]吕祖谦:《古文关键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1册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年,第715页。
- [42][明]王守仁:《重刊文章轨范序》,吴光等编校:《王阳明全集》(中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,第722页。
- [43][清]陆心源: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一百四十四“楼昉编”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6年,第2019页。
- [44][南宋]谢枋得:《文章轨范》卷一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3页。
- [45]参看孙楷第: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年,第27-90页。
- [46]王清原、牟仁隆、韩锡铎编纂:《小说书坊录》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,第2-17页。
- [47][明]酉阳野史编次:《三国志后传》,孔祥义校点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- [48]参看陈大康对该小说成书时间的考辨,陈大康:《明代小说史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年,第371页。
- [49]孙琴安:《中国评点文学史》,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99年,第114页。
- [50][54][55][56]陈曦钟、宋祥瑞、鲁玉川辑校:《三国演义会评本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6年,第2、106、279、1442页。
- [52][58]谭帆:《中国小说评点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8、59页。
- [53][明]熊钟谷编集: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,刘世德、陈庆浩、石昌渝主编: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4辑,北京:中华书局,1990年,第542页。
- [57][明]李贽:《焚书》卷二,张建业主编:《李贽全集注》第一册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0年,第171页。

[责任编辑:李本红]